

思想与方法

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

方维规 主编

Ideas and Methods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 Modern China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方维规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301-25486-8

I. ①思… II. ①方… III. ①文化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G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3836 号

书 名	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
著作责任者	方维规 主编
责任编辑	李 哲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486-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定 价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7 印张 500 千字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9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叙言：概念的历史分量

方维规

“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郭嵩焘：《复李次青》）

“立乎今日以指往昔，异同黑白，病药相发，亦一代得失之林哉。”（魏源：《明代兵食二政录叙》）

近代中国创古今未有之大变局。西学东渐之风潮，改变了有识之士思考民族国家前途的时空观念：地方/国家/世界，过去/现在/未来。新的时空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近人理解古今之变的思维方式，再造了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然而，在动荡的时势剧变中，近代知识建构难以定于一尊，而是通过不同知识人的具体实践，不断产生概念变迁和思想重构，从而引发新旧文化政治的对抗、互动和再生。鉴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复杂语境，机械的中西之辩已很难在今天激发新的思考空间和方法视野。如何在中国问题的内在脉络中探究概念嬗变对近代变革的深刻意义，乃是有待深入开掘的重要路向。就此而言，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之间不断变动的复杂关系，当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关键议题之一。

为了共同探讨这一核心议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于2014年9月22—23日举办题为“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的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这次会议的一个明确目的是，通过凸显概念史研究方法的意义，沟通文史哲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对话，以期拓展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话语空间。会议邀请王汎森和罗志田等二十多位中外著名学者，共同研讨相关理论议题和方法实践。议程分对话和论坛两个部分。在对话部分，王汎森和罗志田两位先生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

度,精辟探讨了近代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的历史演进脉络。^①施耐德(Axel Schneider)先生和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ère)夫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评说了王、罗二者的讲演,其中不乏西方视角。两位对话人还就讲演中的若干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在学术论坛部分,与会学者关注的议题深宏博厚,新见迭出。具体而言,讨论近代语境中概念语义的知识结构及其变化轨迹,无法绕开的问题是概念史方法的理论旅行与本土容受。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德国在历史语义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及其概念史范式,不仅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启了新的思想空间,而且提供了可贵的理论概念。然而,理论所带来的话语张力,却向我们的方法实践提出了挑战:如何领略外来方法的观念脉络,把握其创造性概念的启示意义?怎样审视东亚语境中概念体系的创制过程,反思接纳“新概念”的曲折路径与复杂更迭?这些关键性议题在三位学者(方维规,铃木贞美,章清)的论文中得到深入阐述。显然,对这些方法论议题的探究,有助于我们重视近代历史语境的特殊性。尽管近代中国的俗世化潮流缘起于西方,但它在特定的历史传统中构造出近代思想的重要面向。特殊性并非只是表面差异,亦涵盖深层的文化与民族叙事的重构。就中国历史而言,不同的“中国哲学史”叙述背后的主体性诉求,便是较为典型的事例;而在东亚范围中,则可见出不同民族重述前近代历史的诸种方式。毋庸置疑,不直面这些思想转型的宏观议题(黄克武,张志强,孙江和黄东兰),就无法转化和释放概念史之于近代语境的解释力。

一旦接入东亚概念创制体系,“科学”和“自然”定然属于关键概念。作为近代知识建构的观念前提,今人对这两个概念已习焉不察。正因为此,它们在近代思想中的演进历程,一直没有得到充分梳理和辨析。近代“自然”观念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传入中国的思想后果。但深究起来,“科学”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异,内在于近代知识人在不同思想处境中回应现实诉求的方式。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西学中源”说,深刻地形塑了近代科技的兴起脉络。对这些问题的透彻根究,成为这次会议最集中的议题(王中江,王扬宗,沈国威)。不过,作为近代俗世化的概念表征,“科学”和“自然”对于近代中国人的意义,不同于在西方社会,其背后的历史动因乃是民族国家的现代意识。这种现代意识的发生,经过西方指称中国之“帝国”概念的渐次兴盛,以及近代知识人天下主义/夷夏之辨的剧烈震荡,最终以辛亥革命的“共和”尝试,确立了现代国族认同。文集中四位学者(许纪霖,曹新宇和黄兴涛,陈建华)的精彩论述,

^① 王汎森的题为“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未来’”的讲演,即为这部文集中的第一篇文章。罗志田的讲演题目是“从地方看历史:延续一些既存论述的思考”。后来,罗志田认为他的另一著述更切合会议主题,即这部文集中的第二篇文章:《天变:近代中国“道”的转化》。

为我们勾画了这一思想图景的发生过程及其影响。

事实上，近代中国的俗世化历程，以及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共同决定了新旧文化转型的观念要素。其中，“恋爱”作为关键词，成为我们理解近代新道德与新文学之重要的概念通道之一。不仅于此，在文学领域更为突出的是“文学批评”观念的创生，它对现代文学研究来说意义重大。正是由此产生的一整套新的批评概念，改变了近代学人理解传统的思想视野，确立了文学话语的古今之变。显然，文集的这些以概念为中心的讨论（杨联芬，陈国球，罗钢），为近代文学研究梳理出新的思想脉络。

如前所述，这次会议的主旨是研讨概念史方法对于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意义。那么，会议主题中的“文化政治”意旨何在？换言之，近代语境中的概念史研究，为何需要“文化政治”之说？这里需要对使用这一概念的意图稍做申明。

在一次哲学大会上，一些法国与会者的讲演充斥着解构主义套话和其他一些难懂的行话。听众中有人对其邻座同仁低语：“他们思想自己有思想！”（“They think they’re thinking!”）这一俏皮的讽刺，出自罗蒂（Richard Rorty, 1931—2007）之口。他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也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其实，他早就厌倦了哲学大话，从其成名作《哲学与自然之境》（1979）开始，他便致力于反思西方人探索终极真理的执念。2007年，他的最后一部自选集《作为文化政治的哲学》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哲学、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主张放弃哲学的宏大叙事，别再去碰“真理”“理性”之类的概念。对于人类幸福来说，讨论具体政治远比讨论上帝的存在问题有用得多。有人把该书看做宣言，也有人视之为遗嘱。无论如何，他对哲学的新解，可视为他毕生批判事业的总结。

该书英文原名是 *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在大陆欧洲或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文化政治”多半是政治家的事，涉及文化事业的规划、资助等事宜。而罗蒂所言“cultural politics”，则是文化生活中一切有目的之行为的总括性概念，就如发生在古希腊集市广场（ἀγορά, agora）上的 πολιτεία（*politeia*），与 *res publica* 亦即公共生活相关。罗蒂所要表达的，是作为文化行为的哲学；换句话说：哲学乃文化行为。据此，哲学家的职责也是从事文化政治。在他看来，探讨真理和伦理原则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只需关心那些具有文化意义的问题。文化政治的途径之一，是改变词语的运用，推广新的概念，以更好地开展建设性活动。该书第一章“文化政治与上帝存在问题”，开篇即说他的一个中心思想：“文化政治”之说，亦包含应当使用什么词语的各种理由。我们这次会议主题中的“文化政治”，基本上借鉴了罗蒂之说。

罗蒂将“文化政治”理念运用于语言：怎样的语言运用和词语最适合

于创造一个更人道的社会？这在概念史语境里，当然也有实际意义。罗蒂不在乎注重理性和论证的思维，而是转向“文化政治”，亦即决定人们如何观察世界的言说方式的实际变化。按照他的见解，语言是否和如何呈现现实，不可能在语言之外探讨。“这是红的”，“这令人反感”，“这是神圣的”——这个或那个共同体语言中的这些说法，都与特定共同体的特定需求有关。概念的演变以及不断增长的概念储存，都在促进文化的进步。政治、社会、文化中的基本概念的历史发展，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其《哲学研究》(1953)中所说的“含义即用法”或“用法中的含义”，无疑都与广义的文化政治密切相关。

罗蒂并不专注历史研究，我也不想套用他的新实用主义哲学思维。这次会议之所以借鉴其“文化政治”，主要基于对近代史领域之概念查考的反思。其一，概念史很容易受到这些年流行的新文化史的影响，将概念考据扩展到那些无足轻重的琐碎名物，忽视历史演进中的关键性议题。其二，对于重要概念的探究，往往过分倚重其在西方语境中的位置。至于它们与近代中国历史脉动的关联度，则缺乏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因此，即便是那些推本溯源的工作，也未必能够回应中国近代真正重要的现实诉求。

在此意义上，我们采纳“文化政治”概念，正是希望借助罗蒂所注重的社会实践来强调概念史的问题意识。这意味着，只有关注那些内在于近代中国真实诉求的概念构造，才能打开历史认知的当代视野。概念史并不是简单的清理观念之举，而首先需要把握近代历史的内在脉络和诉求，以此重新定位特定概念的认知地位，从而开掘重要概念变迁背后的社会基础、情感动力和演进机制。惟其如此，才能重新为既有的研究思路注入新的思想活力，寻求历史与现实互动的实践契机。我想，本次会议的这种方法论追求，不难在与会学者的论文中得到印证。这是一次可喜的探索之旅，而真正的范式转换，还有待各方同道的共同努力。

由于篇幅所限，本书未能收入所有与会学者的文章或发言摘要，实为遗憾之事。本次高端对话暨论坛得以成功举行，首先得感谢北师大文学院院长过常宝教授的鼎力支持。在会议主题和议程的设计过程中，符鹏博士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的学生以及北师大文学院和文艺学研究中心的部分学生做了大量会务工作；梅定娥副教授、江天岳博士以及博士生曹一帆不辞辛劳，分别翻译了相关论文；费冬梅博士冒着酷暑，为这部书稿的整理和校阅付出了辛勤劳动，而且一丝不苟；北京大学出版社张冰主任和本书责任编辑李哲，为本书的出版尽心尽力，在此一并致谢。

方维规

2015年7月

目 录

- 1 叙言：概念的历史分量
方维规
- 5 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未来”
王汎森
- 23 天变：近代中国“道”的转化
罗志田
- 46 晚清以来的“复合性思维”
王汎森
- 52 评《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未来”》
罗志田
- 55 “进步”“未来”观念之我见
——对王汎森著述的点滴评议
[德]施耐德(Axel Schneider),曹一帆译
- 60 刍议罗志田论近代中国“道”的转化与文化演变
[法]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江天岳译
- 77 “鞍型期”与概念史
——兼论东亚转型期概念研究
方维规
- 95 概念体系史的研究方法
——从范式转换到概念体系编制史
[日]铃木贞美,梅定娥译
- 115 知识·政治·文化：晚清接纳“新概念”之多重屏障
章 清

- 136 俗世化与近代中国的思想变迁
黄克武
- 151 “经典时代”还是“子学时代”？
——“中国哲学史”的叙述开端与“中国文明的主体性”问题
张志强
- 179 作为事件的他者
——近代中日历史教科书里的前近代叙述
孙 江 黄东兰
- 189 近代中国“自然”观念的诞生
王中江
- 230 “西学中源”说与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兴起
王扬宗
- 245 严复科学思想的渊源：从培根到穆勒
[日]沈国威
- 291 天下主义/夷夏之辨及其在近代的变异
许纪霖
- 306 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
曹新宇 黄兴涛
- 324 “共和”的遗产
——简论民国初期文学文化的转型
陈建华
- 349 “恋爱”作为关键词：清末民初新道德与新文学(1900—1920)
杨联芬
- 387 “文学批评”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方法
陈国球
- 414 “被创造的传统”
——《人间词话》是如何成为国学经典的？
罗 钢



“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
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2014年9月22-23日)



对话人王汎森和罗志田及巴斯蒂、
施耐德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



座无虚席



主持人方维规教授：“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



王汎森院士：“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未来’”



罗志田教授：“从地方看历史：延续一些既存论述的思考”



施耐德教授评析王汎森院士讲演



巴斯蒂院士评析罗志田教授讲演



对话



交流



切磋



“我要提问!”

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未来”*

王汎森

前言

“未来”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它包含的子题很多：“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如何达到“未来”？是谁的“未来”？是谁决定“未来”应该怎样？是谁决定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达到“未来”？在“现在”“过去”“未来”三际之中，“未来”的分量如何？它只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三际中共通的一际，或是它成为压倒性的、唯一最重要的时间？另外，“未来”究竟是遥远难知，因而可以置而不论，还是“未来”是能知的，甚至是“已知”的？以上问题不只牵涉到现实、政治、人生，也牵涉到学术等许多方面。

既然“未来”是个包罗广大的问题，本文不能不对讨论的范围有所限制。在本文中我想要谈的不是近代中国对“未来”想象之内容如何，而是从1900年至1930年左右，短短二三十年间，新派人物的时间意识及其连带的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与计划的巨大变化——“未来”成为一个无以名之的巨大力量，并且尽量将讨论局限化、局限在三种与“未来”有关的议题。

第一，“未来”如何浮现成为一个极重要的观念，“未来”如何成为正面的、乐观的想象，以及“未来”的内容如何成为无限开放，而且随不同个人或团体拟议的东西。因为“未来”意识的不断膨胀，使得人们自古以来习以为常的“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间概念的分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二，探讨一种特殊的时间意识及其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与规化是如何产生的？这种时间意识与想象隐然认为“未来”为可知的、或甚至是已

* 本文曾得到包括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罗志田教授等人的批评，深表感谢。评论内容参见本书第21页注②。本文构思甚久，后来在实际撰写过程中也受到科斯雷克(R. Koselleck)著作的启发。

知的，^①“过去”反而是未定的、或未知的，并以未来完成式出发去思考生活或思考历史。第三，上面两者互相加乘，对近代中国许多层面尤其是日常的生活与抉择产生了重大而无所不在的影响。

这是一个“过去”与“未来”的分量急速调整的时代。至少在有意识的层面中，“过去”的分量变得愈来愈无足轻重，而“未来”愈来愈占有极大分量，使得这个时代的思考、决定、行动的方式也莫不染上这个色彩。

一、近代思想中的“未来”

“未来”这个观念在中国古代虽不罕见，但传统概念中最常使用的词汇是“来者”，有时候则用“将来”。“来者”“将来”与“未来”的意思并不相同，意味着三种不同距离的“未来”。“来者”是近而可见的，“将来”是将会来者、或将要来者，“未来”则指离得更远、更不确定的未来。^②

传统概念中“未来”与“现在”的距离很远，有时候甚至带有预测性，如“预度未来”“卜占可以知未来”；有时与图谶有关，如说“图谶能知能观未来”。有时是宗教性的，如佛教“三际”中的“未来际”；还有禅宗的“如何识未来生未来世”，指的是下一世的事情；或者说“未来佛”，指的是下一个阶段，不知多少年以后的佛。从“中研院”的汉籍文献数据库中可以看出“将来”远多于“未来”，^③而且不像我们今天常三句话不离“未来”。

引发我觉得要好好思考“未来”这个问题的缘由，是因为发现晚清、民国以来，好像伟大的人物都在推销或买卖对“未来”的想象。台湾政治大学有个网站的名称是“未来事件交易所”^④，我一直对他们做的工作感到好奇——没有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可以交易？这不就是晚清以来伟大人物在推销或买卖的概念吗？在传统概念中，未来才会存在的东西似乎不大可能有交易价值。随便翻翻古往今来的史书，都绝对不会像现代人那样处理“未来”，即便谈到未来，也是比较想回到“黄金古代”的想法。但晚清以来的“未来”很不一样，而且愈不一样越好，愈不一样愈吸引人。像康有为(1858—1927)《大同书》里讲的“未来”，是所有星球都可以按电钮投票，所有星球可以选一个共同执行委员会之类的想象——这个“未来”离古书太远、太远了。由于过去的历史与现代的世界相似性太少了，所以许多人宣称历史不再有教训(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仍然是从过

① 虽然从后来者的眼光看，这些只是种种价值观，并不代表对未来真有所知，但当时许多人是这样相信的。

② 清代小说《镜花缘》里就出现很多的“将来”，其实“将来”是“将要来”的意思，而“未来”则可以想成是“未”“来”或“未”可能“来”，而传统经典中如《孟子》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有点未来世的味道。

③ 以“中研院”“汉籍文献数据库”的检索“未来”一词，大约出现了一千多笔资料，其中有许多是指人没有出现的意思，至于“将来”与“来者”，则有一万二千多笔资料。

④ 由政治大学预测市场研究中心和未来事件交易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的网站：<http://xfuture.org>。

去中推导未来)。过去是通过“历史”寻找合法性,现在往往是通过“未来”获得合法性。康有为的《大同书》也许比较极端,但近代许许多多的概念和想象都带有浓厚的“未来”性,在现实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令人不禁要问,在过去百年,究竟是什么促成了新的“未来”观如此畅行?

描述过近代中国的新未来观后,在此想简单地先回顾一下新未来观形成的几个因素。一,西方知识的大量引入,近代西方重视未来的思想文化大幅移植到中国。二,进化论思想引导人们想象美好的时代是“未来”,而不是“黄金古代”。^①三,以“未来”为尊的新型乌托邦思想的引入。传统的乌托邦理想往往以上古三代为依托,新型式的乌托邦则大抵是依托于未来。当时从西方传入的一些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文学作品,如《万国公报》自1891年起刊载的《百年一觉》这篇乌托邦小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②这些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文学作品,展示了一个与传统中国非常不一样的“未来”想象。四,在近代中国,“未来”常代表极度乐观、有光、有热,有主观能动性,甚至带有强烈乌托邦的色彩。“未来”往往与变革或革命连在一起,成为变革中一支有利的武器。任何人只要掌握“未来”,就可以有极大的力量。辛亥革命的成功便是最好的例子,它使得历史跟现在、未来有了完全不同的关系。顾颉刚(1893—1980)说:“辛亥革命后,意气更高涨,以为天下无难事,最美善的境界只要有人去提倡就立刻会得实现”^③,即是一证。“未来”变成是一蹴可就的,而且在现世中就可以达到。不论是戊戌变法或辛亥革命都极大幅度地引进全新的事物,并且带来无限的可能性,使得现在与未来变得和过去完全不再相似,并以新的、不相似的为正面价值。所以它们不但带来一个新的“未来”,也因为人们对过去想象的变化,带来一个新的过去。必须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向往新的“未来”,事实上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虽然转步,却仍未移身,他们不一定都向往过去,他们也可能重视未来,但不一定都向往如此崭新的、陌生的“未来”。因而,新型“未来”的出现造成两种文化,一种是比较向往美好的“过去”,一种是向往美好的“未来”。这两者往往成为分裂的派系,文化上如此,政治上亦如此。

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可以非常粗略地分成两大类,一类面向过去,一类面向未来。晚清以前,世乱非常厉害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想回到更好的、更良善、更道德、更淳朴的古代,道光咸丰年间的许多思想文献中,便有这个特色。当然像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6)等人是向

① 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很多,包括我的几篇论文,如王汎森:《时间感、历史观、思想与社会:进化思想在近代中国》,陈永发主编:《明清帝国及其近现代转型》,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第369—393页。

② 参考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0—323页。

③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页。

往未来的，但他们所想象的未来，不是一个与传统完全不一样的未来。晚清以后，思想家的世界中，不可知的事物变得更有力量，不可知的“未来”渐渐压倒了已知，与现实离得愈远的“未来”吸引力愈大。

如果以光谱上的深浅浓淡作区别，那么在三民主义阵营中，也有基本上比较面向“过去”与比较面向“未来”两种类型的区分。戴季陶(1891—1949)的《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显然是比较面向过去，而周佛海(1897—1948)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则是偏向未来理想的构建。相比之下，国民党的文宣大将叶楚傖(1887—1946)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仍然坚称中国古代是由黄金美德所构成的，胡适(1891—1962)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便特地提出叶氏的观点作为攻击批评的靶子。^①

以政治领袖来说，也有比较面向新“未来”，和比较不面向新“未来”两种类型。前者的例子是毛泽东(1893—1976)，后者的例子是蒋介石(1887—1975)。蒋介石好谈四维八德、好谈道统、好谈中国古代圣贤的美德；而毛泽东则是破除传统、不断以未来社会主义的前景来说服同志与人民。蒋介石、毛泽东提到传统与未来的频率，也是截然大别的。他们所读的书也各有代表性。蒋介石好读哲学书，尤其是宋明理学及先秦诸子。他说自己读明朝胡居仁(1434—1484)的《居业录》“不忍释卷”；读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贺麟(1902—1992)《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及周敦颐(1017—1073)的《太极图说》，也都表现出很大的兴趣。^②从蒋介石的《五记》，尤其是《省克记》和《学记》可以看出，蒋介石最根本的想法还是想寻找通向美好过去的途径，或在有意无意之间揣想着如何把经书里讲的哲理变成现实。毛泽东则是好读历史、重视现实，历史的价值除提供许多可资参考的范例外，辩证唯物论及社会发展史则是了解“未来”、迈向“未来”的指引。向往美好的过去和向往美好的未来变成两种非常不同的思想和行动型式。

二、历史书写与新“未来”观

“未来”变得重要，与“未来”变成是可知的或已知的是两回事，后者是比较令人诧异的，我想在这里从历史书写的角度，试着为这种新“未来”观提出一些解释。

近世西方因为革命及各种重大的社会变动，使得过去的历史与当代社会之间的相似性愈来愈少，故过去那种提供相似的古代范例作为现代

①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2：6—7，1929年，第11—25页。

② 参见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台北：国史馆，2011年。